

李达《货币学概论》的写作前后 及出版的伟大意义

——纪念李达诞辰一〇一周年

尹 进

一

(一)

萦思建党南湖舟^①，志士丹心立大猷。
奋力传薪播马列，惊雷一震醒神州。

(二)

屹立讲坛数十秋，如椽巨笔砥中流。
精诚冲破寒山雪，赤胆迎来春色稠。

(三)

惨罹浩劫抑何由？呜咽东湖水尽愁。
我欲哭灵何处觅？夜深伏枕泪潜流。

(四)

乌云横扫鬼魅囚，日照珞珈翠柏幽。
丹鹤长鸣声永在，宗师仰止万年讴。

以上是我同老伴关伊菲同志于一九八六年武汉大学举行“纪念李达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时所写的《怀念鹤师李达》的四首诗，当年就蒙广州出版的《诗词集刊》予以第三期发表了。有同志看了说，情感浓郁，反映了李达的伟大一生。去年是鹤师诞辰一百周年，先是八月间由武汉大学

哲学系、中山大学哲学系、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和《现代哲学》编辑部联合在广州召开了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及李达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接着十月下旬由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湖南省社联、湖南省哲学学会、湖南省党史人物研究会和湖南大学联合发起，在李达家乡湖南冷水滩市召开了李达诞辰一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和纪念大会。十月底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联合发起，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同时在湖南省委领导部门和兄弟院校等单位参加下，湖南大学又在长沙举行了李达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所有这些纪念活动，都歌颂了李达的伟大一生，其中中顾委常委胡乔木同志在首都座谈会的讲话中说到：“李达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理论家、著作家，他是多方面的学者”，“在我们党将近七十年的历史，还很少有象李达同志这样勤奋，这样有丰富的卓越的成就”。我们觉得，胡乔木同志这几句话，确切地概括了事实，最值得全面领会。因为从鹤师遗留给我们的全部著作成就看来，不仅有人们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多方面的理论著作；而且还有为人们

鲜知的货币学、法理学乃至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著作等等。在这里,仅就我所知道的鹤师从事《货币学概论》一书著作的前后情况,缕述如下;并对其出版意义,谈点粗浅看法,以供大家更全面地了解李达伟大一生的具体情况和研究其经济思想之参考,并请指正。

二

鹤师于一九三二年秋^②,从上海到北平,开始在北平大学法学院(后扩充为法商学院)经济系任教。先讲社会学课,也就是讲现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达文集》第二卷中那部《社会学大纲》;后兼经济系主任,又兼讲经济学课,也就是讲继续出版的《李达文集》第三卷中那部《经济学大纲》。记得直到一九三五年暑期我大学毕业,鹤师不曾担任货币论课的讲授,但事实上从一九三四年起,他就开始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并着手写《货币学概论》一书了。这是因为,自一九二九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没多久便由工农业生产过剩危机渗透到货币流通和信用稳定根本破坏的货币信用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被迫纷纷放弃其多年实行的金本位货币制,英国首先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宣布废除,接着葡萄牙、爱尔兰、北欧各国和日本等都宣布废除。美国则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宣布废除。以后法国、荷兰、瑞士等国也都于一九三六年宣布废除。这样,到三十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各国的金本位货币制度,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终于崩溃^③。随着这种货币制度的崩溃,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各自的货币集团,在国际间展开货币集团之间激烈的货币战,一些殖民地、特别是半殖民地国家便沦落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摆脱和转嫁经济危机与货币危机的战场。当时在国际间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旧中国,首先遇到的是外货倾销,工业疲敝,谷贱伤农,农业危机。接着便是白银大量外

流,国内金融奇紧,银本位制的货币制度根本动摇。国民党政府先遵英国经济顾问旨意,进行币制改革,使其法币成为英镑集团的附庸,然后又通过《中美白银协定》,使其法币同时依附于美元集团。国际和国内货币制度这样的空前重大变化,自然引起中国学术界极大重视,全国重要报刊,不断刊出评论文章。有为挽救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危机出谋划策的;也有为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宣传效力的。我们又应当怎样地科学看待?在当年北平“文总”和“社联”革命组织领导下,我先试写这方面有关文章,分别发表在平津报刊和法商学院《法学专刊》上,引起鹤师的重视。于是在一九三四年秋,写好《世界金本位制崩溃的现阶段》一文,交鹤师审阅。鹤师看后,当决定试行向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投稿。也就在这时,鹤师对我说,“世界金本位制崩溃的现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各国本位货币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恐慌第三期的必然现象,你紧紧抓着这一点分析问题是对的。但这还不够,这还算是就问题谈问题。从目前世界本位货币恐慌中出现的货币理论混乱情况看来,为了有力地批判各种错误看法,必须从根本上树立正确观点,必须学习《资本论》,发扬《资本论》中的货币理论。我要写这样一本书,目前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书,需要这样的书”。这就是鹤师写《货币学概论》动念的起因和着手的开始。

后来到一九三五年初春,我那篇论文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当再向鹤师汇报时,鹤师对我说,“我写的货币理论书,已经写了一些了,工作再忙,每天也要坚持写一千字左右”。

鹤师当年教学工作确实很忙,又以政治活动需要,经常会见进步教师和进步同学。写《货币学概论》以前,一九三三年春曾受党嘱托到张家口对冯玉祥将军进行革命理论

讲述：一九三四年夏参加宋庆龄、何香凝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的有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签名运动。写《货币学概论》以后，他同师娘曾做过一项当时极为秘密、现在也很少人知道的革命工作。即一九三六年春，著名作家丁玲从南方脱难，先到北平，便藏于师娘内室。我现在的老伴、当年的女友关伊菲同志有一天下午就在师娘内室亲眼看到。以后在鹤师多方帮助下，找到组织。丁玲才辗转转到延安^④。综合这些情况，足见鹤师于三十年代，乃是在繁忙的教学工作和为党的政治活动中，每天抓紧时间，不辞辛苦地写《货币学概论》著作的。

《货币学概论》何时写完定稿，我则不清楚。因为直到抗战前夕一九三七年六月底，鹤师将新由上海笔耕堂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嘱我亲交冯玉祥将军时^⑤，未谈及《货币学概论》一书的写作情况，以后直至逝世前，也从未听他讲到该书稿何时写完定稿之事。不过有些迹象和情况，可供分析判断。鹤师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为其所著《社会学大纲》第一版序中说：《社会学大纲》“第六篇未曾着手，而我的研究重心，已移到经济学货币学方面，因而预定的第六篇，最近实无法编写”^⑥。我们知道，当年作为鹤师经济方面研究成果，《经济学大纲》已于一九三五年当作法商学院教材印行了。由此可见，到一九三七年四月间，剩下的研究工作，只是有关《货币学概论》的写作了。在这一点上，依我看，工作量也不会多了。因为自一九三四年鹤师开始这方面研究，一九三五年《经济学大纲》印行后，自然更可集中时间来写，这样，到一九三七年四月，肯定全书稿已基本完成。所剩下的工作，只是收尾和校定稿而已。至于这个收尾和校定稿的最后完成在何时？则有三种可能。（一）即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以后，六月

间便完成了。（二）迟至一九四九年五月鹤师同师娘回到北平，于书稿交书店付印前完成。因为早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底，鹤师是有幸于“七七”事变前只身离开北平的^⑦。那时他不可能预料到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将《货币学概论》书稿带出。后来师娘携子女秘密南下，恐敌人检查，也不可能带出。当年师娘曾将住宅托可靠人居住留守，书稿也就得以保存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三）也可能师娘于当年南下时将书稿带出。如此种估计属实，则应是一九三八年鹤师在广西大学任教期内完成。以后直到解放前数年内，鹤师不可能做这项结尾工作。如一九三九年他在重庆为冯玉祥将军及其研究室人员讲学时，由于身体不好，连因接毛泽东主席信，邀赴延安^⑧，都不能成行；哪还有心意和精神来完成旧书稿余事。进入四十年代后，家乡沦陷，国民党当局反共日趋加剧，鹤师生活，坎坷增多，更是不可能的了。以上三种估计，第二种可能性最大。正因为这样，这部著作中有两处出现了“二次大战前”和“到二次大战前夜”用语^⑨，并不足怪。当然，尽管如此，从整体看来，这部著作还是鹤师三十年代研究成果。若不是抗战爆发，早在一九三八到一九三九年间就出版了。所以，《李达文集》第三卷“编者的话”确认为“是李达同志三十年代在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之一，完全是对的。

三

《货币学概论》书稿虽然是早在三十年代所写，可是延至一九四九年七月解放战争即将获得全国胜利期中，才得作为新中国大学丛书公开出版。从鹤师一生学术思想贡献来看，这部著作的出版，就个人粗浅的认识与理解，主要有列四方面的伟大意义，值得研究领会。

第一，正因为这部著作是三十年代所

写,首先就应当结合三十年代中国货币理论研究状况来评价这部著作。前面说过,鹤师写这部著作,乃是鉴于当年中国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著作而又非常需要这样的著作才着手写的。事实正是这样,二、三十年代旧中国出版货币理论书,多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大单位承印。商务先于一九二四年出版了“大学丛书”王恰柯编译《货币学》,以后直到一九三五年还再版。其书首“弁言”中即称:这部书乃是以美国学者肯列《货币学》之“学理为经,采所辑之故实为纬,错互成书”;“繁难之处,在论货币价值与信用物价诸章”,“所据之原理,则不外‘限界效用说’”,即不外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的一派,以主观心理解释价值形成过程的学说。另在一九三五年,商务还出版了“汉译名著”岑德彰译美国学者甘末尔《货币论》。译者在书首序中说,这部书针对当年英美诸国放弃金本位制后出现的新情况,对于“通货膨胀之害,阐发无遗,结论以回复金本位为唯一救时良药”。即完全是为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货币危机开处方的。另在中华书局方面,一九三六年出版一本“大学用书”刘觉民《货币学》,作者在书首序中说:“我们的研究态度,绝对不应为一家之言所囿;我们必须博采群言”。因而书中对货币的定义,首先条列西洋学者所说,以分四派,然后略陈己见;对于货币的本质,也是先列别人三种说法,然后补述己见而已。这些货币理论书,在当时说来,虽不能完全否定其一般知识性的学术价值;但毕竟都不是具有真正社会科学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著作。只有鹤师的《货币学概论》,根据货币学专业书的需要,运用并发扬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二、三章商品与货币理论,先写出了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机能并批判各派货币学说,然后运用并发扬《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

十五章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有关货币资本和信用制度理论,结合历史事实的阐述,写出了信用与信用货币及资本主义的货币体制;最后运用并发扬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和斯大林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系列论述,结合自己对现实的考察,写出了资本主义金融恐慌和金本位制的崩溃等。这就充分说明,《货币学概论》乃是早在三十年代中国最早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一部著作,它不仅标志着中国货币理论领域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同时,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角度来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向部门经济专业渗透的开端,显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第二,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学者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著作,如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世界史等等,都有较高的水平,被译为中文本的,也时有所见。但在货币理论专业书方面,则直到一九三六年底,才看到一部日文译本的,即由著名经济学家科兹洛夫主编、七位专家合写的《货币与信用》第一卷资本主义篇。后来到一九三八年,在我国也出现了从日文本转译的中文本。这部著作共五编二十章,一编辖一至四章,讲“马克思=列宁关于货币本质的学说”;二编辖五至八章,讲“资产阶级的货币理论”,即批判各式各样的名目论派和货币数量学说派;三编辖九至十三章,讲“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四编辖十四至十五章,讲“纸币及通货膨胀”;五编辖十六至二十章,讲“资本主义总危机时代的货币流通”。从其全部结构看来,基本上和鹤师的《货币学概论》相同。即在体系和层次上,都是运用和发扬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先讲货币的本质,批判各派货币学说,然后论述信用及资本主义货币危机等等。但如进一步具体地从章节标题

和内容的侧重面等来考察,则会发现,又有所不同。如《货币与信用》开始既以“马克思=列宁关于货币本质的学说”为编题,在章节层次安排上,自然就形成了先讲马克思有关货币理论,然后讲货币理论的列宁阶段,对于货币的本质和货币的职能,都没有单独醒目的大章节标题;而《货币学概论》开始即以“货币的本质”为第一章章题,接着又有一章以“货币的机能”为章题,集中讲货币的职能。再如《货币与信用》在讲“资产阶级的货币理论”中,只批判了各式各样的名目论派和货币数量学说派,没有批判金属论派;而《货币学概论》则首先批判货币金属论派,然后才继续展开对名目论派和货币数量学说派的批判。又如《货币与信用》仅在第五编内以一节的内容,简略地论述了金本位制危机及其崩溃;而《货币学概论》则在最后专设一章,详细地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金本位制危机及其崩溃的现阶段,并考察了各个货币集团崩溃的现实过程。综合这些情况,根据货币学研究对象的要求来对比衡量,应该说《货币学概论》的体系和内容,更为严谨,更为完备。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读到一九五〇年经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作为财经院系教材的布列格里教授《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流通与信用》一书,首先第一章章题,就是“货币的起源、本质和机能”,第一编的编题也再不是“马克思=列宁关于货币本质的学说”。其次在批判各派货币学说方面,增加了对金属论派的批判,正象《货币学概论》那样,也排在批判一章的首位。另外,在论述资本主义总危机条件下的货币信用制度时,以两节的内容,考察了有关金本位危机及崩溃的现阶段。由此可见,即使放在三十年代世界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水平上来衡量,《货币学概论》也是高水平的。

第三,《货币学概论》中的许多论断,

不仅在三十年代,即在今天,也有很多值得学习领会之处。这里仅就鹤师曾对我说过、而书中又没有多予发挥并有现实研究意义的三处,谈点粗浅领会。

(一)在讲到“货币的历史”时,书中特别联系中国历史实际指出:“中国古代曾以珠、玉、龟、贝、布、帛为货币”^⑩。自一九六〇年起,我转任经济史教学后,有一次鹤师教导如何踏实地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谈话中,也这样讲过。可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恰恰在这项历史事实上,史学界却长期存在着意见分歧。单就贝充当货币来说,它始于何时,就有父系氏族社会前期、父系氏族社会后期、商代和周代四种说法,再加以这些年来又有不少同志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关于社会大分工的论断是否适合于中国历史实际,提出怀疑,使问题更趋复杂。现在读到《货币学概论》中这方面论断,深切感到,这书中的论断,乃是鹤师在列举世界各古老国家或地区最初使用各种原始货币(实物货币)之后,紧跟着作为同样的“历史上显著的事实”提出来的。这就启发我们理解到,中国历史上的贝、布一类的原始货币,理应同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原始货币一样,也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初期,而不应断定在父系氏族社会前期或奴隶社会中期乃至晚期的商周时代。至于社会大分工在中国远古时代的出现时限,也应如是看待。鹤师早年的这方面的全面论断,对当今学术上疑难问题争论的解决,仍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二)在讲完世界上各资本主义国家“金本位制的崩溃”现实过程的最后,书中指出:“法国也和英美一样,从这时起实行通货管理了”^⑪。这显然是鹤师在当年对客观现实进行科学考察所得出的结论。也就在鹤师这种科学考察结论的思想指导之下,我在当年又写了一篇《世界币制的将来与管理

通货》论文,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二十四号发表。但什么叫通货管理或管理通货,《货币学概论》中没有多谈。据我回忆,一九三五年间,鹤师曾对我说过:“通货管理的理论,是英国凯因斯创立的,这种理论反映了对金本位的失望,是当今适应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恐慌并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必然到来的新币制试深”。事实表明,鹤师的论断是准确的。凯因斯早已于一九四六年去世了,但凯因斯的管理通货理论,则一直被各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并发展着。如美国现在虽然出现有象弗里德曼那样自诩“对抗凯因斯革命的革命”的现代货币主义领袖;但也依然有以托宾等为代表的所谓“后凯因斯主流派”,仍然适应着他们国家货币干预的需要而起作用。现在的事实使我们看得很清楚,鹤师早年所说的英、美、法等国所实行的通货管理,实质上就是现在我国一些《资本主义货币银行学》中所讲的三十年代金本位制崩溃后,直到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实行的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由此可见,鹤师当年的科学考察结论,直至今日,还值得很好领会,并应继续深入研究。

(三)在讲到“货币的诸机能与商品生产关系”的最后,书中特别强调,“货币这个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现在也还存在着。不过,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货币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货币,其性质全不相同,并且货币之阶级的作用,又具有另一种意义”^⑩。早在三十年代的旧中国,这种指出是特别具有革命意义的,那时,鹤师也曾不断地向我提示过这一点,而且还具体些。正是在他的不断提示下,我于一九三七年完成了《苏联货币之研究》一篇论文,发表在当年《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秋季号,比较具体地阐述了他这方面货币理论的学术思想。当然,在今天说来,大家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教

育,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性质和作用明确多了,同时在研究方面也深入多了。如单就我国而言,不仅出版了不少有关社会主义国家货币理论乃至关于人民币是否代表黄金讨论的论著,而且还开始出现了“货币供求问题研究系列专著”^⑪,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再有,六十年代初,我国经济理论界曾有过一次货币是否有阶级性的争议^⑫。鹤师《货币学概论》明确指出,所谓货币阶级性,乃是就“货币机能与生产关系的关联而言”,“即说明货币在各种社会中的阶级的作用”^⑬。于是书内在依次分析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阶级性之后,最后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又具有另一种意义”。十分明显,鹤师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是科学的。这就更使我们充分看到,早在三十年代的旧中国,《货币学概论》明确地揭示到这一点,唤起人们在学习和研究货币学时,结合各种社会制度下作用的比较,向往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积极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第四,《货币学概论》于三十年代写成,未能及时出版在当年旧中国学术思想领域起革命作用,固属憾事;但它延至一九四九年七月间,在解放战争即将获得全国胜利期中出版,所起的特别适应需要的积极作用,更值得重视。由于旧中国没有出版过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专业书,全国解放了,人们普遍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到来,高等院校中的财经各系,特别需要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的货币学著作作为教材,《货币学概论》的出版恰好适应了这种急需,因而不到一年,就又再版了。直到一九五二年秋,鹤师任湖南大学校长时,鉴于中国人民大学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已译出苏联布列格里《资本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新书即将出版,而自己又无暇根据新材料对《货币学概论》进行增(下转第76页)

报》1990年1期,第21、22页。

③Montgomery, "Auditing Principles", (textbook, 1923), pp39—45.

④W. A. Paton, "Accountants Handbook" 2nd edition,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34.

⑤Montgomery, "Audi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6th edition, (1940) p29.

⑥Arthur Warren Hanson, "Auditing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42) Preface.

⑦⑧⑨Arthur W. Holmes, "Auditing,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 Richard D. Irwin, Inc., (1945) p119, 119, 129—130.

⑩⑪AICPA, "Statement on Auditing Standards", No. 1 (1972).

⑫Martin A. Miller, Larry P. Bailey, "Miller's Comprehensive GAAS Guide", Miller Accounting Publication, Inc., (1985).

⑬Christian Oehler, "Audits and Examinations,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49) p72—73.

⑭Lee D. Parker, "Developing Control Concepts in the 20th, Centur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6) P67, 76.

⑮⑯⑰⑱Louise Boone, David L. Kurtz,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2nd edition, Random House, Inc., (1984) 29, 30, 30, 31.

⑲审计署科研培训中心翻译印发《美国会计总署审计准则》, (1981年修订本), 第43页。

⑳Auditing Standards Board, "Codification of Statements on Auditing Standards" (AICPA, 1984) AU320.27.

㉑Walter G. Kell, Richard E. Ziegler, "Modern Auditing", 2nd edition, (1980), p108.

㉒Jerry D. Sullivan, et. al., "Montgomery's Auditing", 10th edition, (1985) p249.

㉓资料来源: Kell等著 吴文流译,《现代审计学》第四版, (1989年, 台湾西书出版社, 1989年出版, 第147—153页。

㉔徐玉棣译,《美国政府审计标准》(下),《审计研究资料》, 1990年1期第12页。

(责任编辑 徐开榜)

(上接第47页)函致书店不用再印了。这又充分说明, 鹤师对自己著作出版发行的一种严肃认真态度。在今天说来, 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注释:

①李达, 字鹤鸣,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1921年大会先在上海召开, 旋为避侦探破坏, 移嘉兴南湖续开。此乃因嘉兴为李师娘王会悟同志家乡, 以是大会的续开, 更多得力于鹤师夫妇精心布置安排。

②拙文《鹤师早年在北平教学二三事》(见武汉大学出版社《为真理而奋斗的李达同志》一书245页)误印为“一九三三年春”, 特此更正。

③前不久薛暮桥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发表一论文中说:“西方国家直到70年代初期才放弃金本位”, 不同于经济学界一般说法, 可能基于对金本位制的另一种解释。

④丁玲于粉碎“四人帮”后, 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曾亲自讲到此事。

⑤当时我正在冯玉祥研究室工作。

⑥见《李达文集》第二卷第5页。

⑦这里说“有幸”, 是因“七七”事变时, 北平沦陷, 有天上午, 日本宪兵闯进鹤师的北平宗帽三条住宅, 适我当年女友关伊菲同志正在同师娘研究逃离沦陷区方策。宪兵先将她同鹤师子女心田、心怡、心天押在屋角不准动, 即逼师娘“交出李达”。边逼边打嘴巴, 然后带走。后因宪兵查到鹤师在上海发致师娘一信, 方信李达确不在北平, 始将师娘放回。此事足证当年鹤师革命言行同敌对者矛盾之尖锐程度。

⑧一九三九年夏, 我老伴关伊菲同志在鹤师重庆住处亲眼看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是年秋, 她到河南战地告诉我, 也一直记得此事。

⑨分见《李达文集》第三卷675、828页。

⑩⑪⑫⑬分见《李达文集》第三卷540、896、614、608页。

⑭详见黄达主编、邓乐平著:《中国货币的需求》总序。

⑮详见侯恒、顾士明主编:《〈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争议》第247—252页。

(责任编辑 傅殷才)